



阿·托尔斯泰著

苦难的历程

第一部

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书 号：10019·656
定 价：1.00 元



苦难的历程

第一部

“两姊妹”

〔苏联〕阿·托尔斯泰著

朱雯译

(一) 苦难的历程

出版 封面 出 学 文 人

(号881流大内陆京北)

京安河行莫河重南中半部省川四

幅 中 飞 幅 中 半 部 市 重

7页册一子11册原 古米新8811×028半元 000.3333字

册中本1重流重民0半701 册上版京北民01半727

000.851-100.02 版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A. H. ТОЛСТОЙ
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

据 Edith Bone 英译本 “Road to Calvary” (Alfred A. Knopf, Inc., New York, 1946) 转译。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英译本 (1953) 及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俄文本 (1950)，并参考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法译本 (1954) 校改。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苦 難 的 历 程

第一集

“救救两”

苦 難 的 历 程 · 图 [郑 花]

苦 難 的 历 程

苦 難 的 历 程 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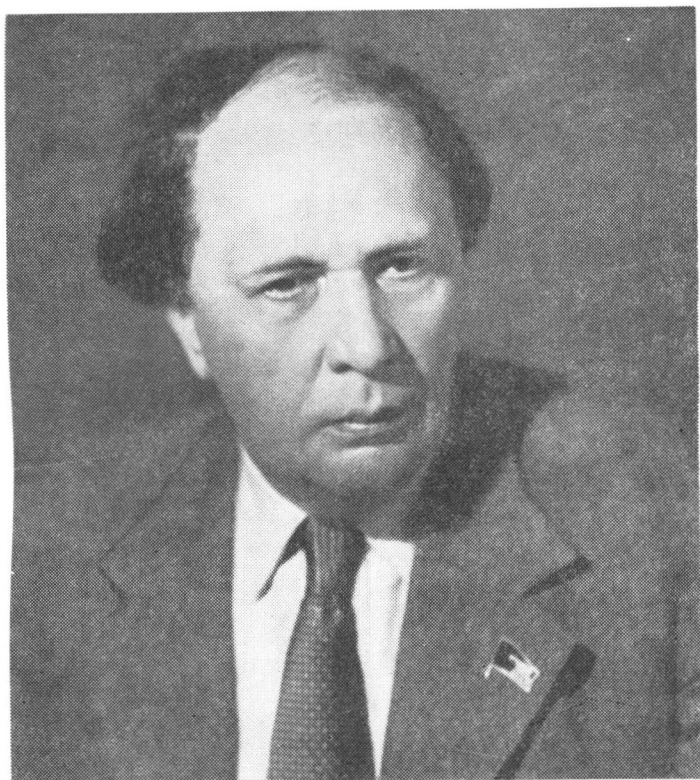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262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16}$ 印张11 $\frac{2}{3}$ 插页7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重庆第4次印刷
印数：26,001—126,000

书号 10019·656 定价 1.00 元

京 北 · 平 武 武 武 一



作者像

阿·托尔斯泰自傳*

我是在草原中的一个农庄上长大的，那地方离薩馬拉大約有九十俄里。我的父亲尼古拉·阿历克賽耶維奇·托尔斯泰是薩馬拉的地主。我的母亲阿历克山德拉·列昂节耶芙娜娘家姓屠格涅夫，是尼古拉·伊凡諾維奇·屠格涅夫^①的姪孙女；她离开我的父亲时，肚子里正怀着我。她的第二个丈夫，我的繼父，阿历克賽·阿波洛諾維奇·鮑斯特罗穆那时候是尼古拉也夫斯克（便是現在的普加乔夫斯克）的地方自治局委員。

我母亲离开时，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——阿历山大、穆斯契斯拉夫和女儿叶丽柴維妲。她走上了艰难的生活道路——她平素在貴族社会中的一切交往，不得不完全摒絕；所有原来的家庭关系，也不得不一齐斬断了。那时，女人跟丈夫离异是一种罪恶，一种墮落行为；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，她是从一个正經的好

* 本文根据附在“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”（1950年版）卷首的“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(Кратка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)”并参照艾維和塔契安娜·李維諾娃的英譯文（附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“Ordeal”卷首）譯出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① 尼古拉·伊凡諾維奇·屠格涅夫（1789—1871）是財政和社会工作者。反对帝俄的农奴制度。并因参加1825年12月14日反对沙皇的暴动，被判死刑。后来由于出走国外，死刑未曾执行。——英譯者注。

女子一变而为举止失当的不体面的女人。对这件事，所有的人，連她父亲列昂节·鮑利索維奇·屠格涅夫和她母亲叶卡捷琳娜·阿历克山德罗芙娜在內，都有同样的看法。

我母亲决定走这艰难的一步，不止是因为她对阿·阿·鮑斯特罗穆怀有极大的爱情；就当时而論，我母亲是一个富有教养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女作家（她写过一篇长篇“不安的心”和中篇“穷乡僻壤”，后来又写了几本儿童讀物，其中最流行的是“女朋友”）。八十年代的薩馬拉社会——当时被放逐的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到薩馬拉来——呈現出一种令人憎厌、使人沮丧的景象。富有的面粉商，大量收买貴族庄业的地产商，游手好閑、頹唐潦倒的草原上的破落地主：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人物，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底子——那就是小市民的庸俗；这种情景，高尔基描繪得多么生动出色，他下笔时自有无限的憎恨。……

在这个可怕的、滿是尘灰的、丑恶的城市和周圍的郊区中，人們都过着酗酒的、猪一般的生活。……当小地主阿·阿·鮑斯特罗穆——年青的美男子，自由主义者，爱好讀書、有着“求知欲”的人——一在这里出現，我母亲面前便摆着一个生死的问题：腐烂在肮脏的泥沼中呢，还是走向崇高的、精神純洁的生活里去？于是她向新的丈夫，向新的生活——往尼古拉也夫斯克走去了。就在那里，我母亲写了两个中篇小說，題名叫做“穷乡僻壤”。

阿历克賽·阿波洛諾維奇，这个自由主义者和“六十年代的繼承人”^①（“六十年代”这个詞儿，在我們家里一提起总是极其

① 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进步的民主主义的作家們，他們批判 1861 年 2 月 19 日的农民改革，而且宣揚革命口号。这运动包括車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、赫爾岑、奧迦辽夫等人在內。——英譯者注。

尊敬，而且認為是最崇高的)，不能和尼古拉也夫斯克的草原地主們相處，因此他在地方自治局改組落選以後，便帶着我的母親和我（那時候才兩歲）回到索斯諾夫加他自己的農莊上去了。

在那兒度過了我的童年。果園。圍着柳樹和茂密蘆葦的池塘。草原上的卡格拉小河。伙伴——鄉下孩子們。騎乘的馬。長着羽茅草的原野，在那兒只有丘塚破壞那單調的地平綫。……季節的變換，象是件重大的、而且永遠很新鮮的事情。這一切，特別加上我是孤零零地獨自長大的這一點，使我的想象力得到了發展。……

當冬天來到，果園和房屋都蓋滿了雪的時候，夜里就聽到狼嗥。當風在火爐的煙囪里象歌唱般呼呼作響的時候，在陳設得很簡陋、牆壁用泥灰粉刷過的餐室里，掛在圓桌子上面的吊燈就點起來，于是我的繼父就常常大聲朗誦涅克拉索夫、列夫·托爾斯泰、屠格涅夫的作品，或者閱讀最新出版的“歐洲新聞”上的文章。……

我母親一邊聽一邊結襪子。我画图或者涂顏色。……沒有任何意外會來攪亂這個古老的鄉村木房子里的這些夜晚的寧靜，在這所房子里燃燒着牛糞或是麥稈取暖，從粉刷過的暖炕里發出一股灼熱的氣息，而且得點了蠟燭才能在一間間黑暗的屋子裡走動。

兒童讀物，我差不多沒有讀過，大概我沒有那些書。我喜愛的作家是屠格涅夫。我開始聽到朗讀他的作品，是在七歲那一年冬天的晚上。其次是列夫·托爾斯泰、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。（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我們家都認為有些恐怖，覺得他是一個“殘酷的”作家。）

繼父是一個勇敢的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。他讀過柏格

尔①、斯宾塞②、奥古斯特·孔德③等人的作品，而且最喜欢作思想问题的争论。但这并不妨碍他让工人们住在地板已经烂掉、墙壁已经动摇、有着那么多蟑螂的东倒西歪的下房里，也并不妨碍他让他的“下人们”吃那腐臭的咸肉。

后来，马克思主义者们被放逐到萨马拉来了，继父就和他们认识，而且和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辩论，可是他没有读通“资本论”就把它放弃了，他已经满足于孔德和英国经济学派的著作。

我母亲也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可是我觉得她好象偏重理论而不切实际。母亲很怕死，她喜欢幻想，而且常常写作。不过我继父很严酷地迫使我母亲接受他的“思想”，因此在她那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中，教师、乡村的产婆、地方自治局的工作者往往发表过于带有“政纲性”的独白。

我从十岁起，读了很多的书——仍然都是那些古典作品。可是过了三年，他们把我勉强安插在（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时各科差不多全是二分）苏士兰实验学校的时候，在市立图书馆中我找到了儒勒·凡尔纳④、斐尼摩尔·古柏⑤、曼·李特⑥等人的作

① 柏格尔(1821—1862)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② 斯宾塞(1820—1903)是英国哲学家、资产阶级学说实证论的代表者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③ 奥古斯特·孔德(1798—1857)是法国哲学家、数学家、资产阶级学说实证主义的创始者。虽然他的实证哲学是对于唯心论的局部的反抗，但它本身仍充满了唯心论的矛盾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④ 儒勒·凡尔纳(1828—1905)是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，著有“格兰特船长的儿女”、“十五少年”等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⑤ 斐尼摩尔·古柏(1789—1851)是美国小说家，著有“最后的莫希干人”等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⑥ 曼·李特(1818—1883)是英国少年读物作家，著有“小猎人”等。——译者注。

品，于是我出神地吞讀着它們，虽然我母亲和繼父都不以为然地認為这些书尽是胡說八道。

在进苏士兰实验学校以前，我一直在家里讀書；繼父从薩馬拉請来了一位教师，那是神学院学生阿尔卡奇·伊凡諾維奇·斯洛伏奧霍托夫，是个麻臉的、火紅色头发的、善良的人，我跟他相处得很好，不过我沒学到多少东西，也沒下过很多工夫去学习。接替斯洛伏奧霍托夫的是一个被放逐的馬克思主义者。他在我們家过了一个冬天，无精打采地为我讲解代数，无可奈何地望着在窗子上轉动的鉄通风器，不肯輕易跟我繼父展开理論性的爭辯，到第二年春天他就走了。

有一年冬天——那时我大約十岁——母亲劝我写一个故事。她很想叫我成为一个作家。好几个夜晚，我都专心致志地在描写一个名叫斯焦普嘉的孩子的奇遇。……現在这篇故事的内容，我一点也記不起来，除了有这么一句，說是雪在月亮底下仿佛钻石一样地发光。钻石我虽然从沒見過，可是我喜欢这样的描写。关于斯焦普嘉的那篇故事，显然是写失敗了，因为我母亲从此再也不强迫我創作了。

在十三岁以前，那时还没有进实验学校，我过着沉思的、幻想的生活。这当然并沒妨碍我整天消磨在刈草場上、割禾場上、打谷場上，和村童們一块儿在河上玩；也沒妨碍我在冬天到熟識的农民那里去听神話、故事和唱歌，去玩牌：“打鼻子”、“封王”、“出王牌”，玩骨彈，在雪堆里玩拳击，在圣诞节化粧，騎沒有轡头、沒有鞍子之类的不馴的馬。

从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三那三年的大飢荒，給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这印象到今天还留在我心里。那时候泥土都裂开了，花草树木都干枯了，叶子都飞散了。田野里一片焦黃。地平綫

上籠罩着一股把一切都燒光了的、朦朧的烟霧的巨浪。

乡村茅舍的屋頂都弄得光溜溜的，稻草拿来餵家畜了；还活着的、疲憊的牲口不能不拴在橫木上，让牠們立着。……在这几年中，繼父的产业好容易保留下来。……可是过了几年，他仍然不得不把它出卖了。……整个薩馬拉省都归到大地主舍哈巴洛夫手里去了，这个人收买了所有貴族的田地，巧立名目地勒收佃农的年租。

一八九七年，我們永远离开了索斯諾夫加，这地方被一个綽号叫做“邮政局长”的富农买去了，这个人巧妙地搶了一次邮局，把搶来的錢隱藏了十年（这是法律上的时效期間），随后开始过他那富农的幸福生活。我們迁到薩馬拉城薩拉托夫斯卡雅街上的私宅里，这房子是我繼父还了押款，付了欠款，用余剩的錢买下的。

一九〇一年，我从薩馬拉的实验学校毕业，去到彼得堡准备应考。我預备进斯·伏伊欽斯基預备学校（在契里奧基）。考取了工学院以后，我就进了机械系。

我最初的文学嘗試是在十六岁的那一年——模仿涅克拉索夫和納德松写了一些淺薄的詩篇。我記不起是什么东西鼓励我写这些詩的——大概是，找不到地方发洩的、空洞的幻想。那些詩写得很平凡，于是我就放弃写詩了。

可是我仍然一再向往于那还未形成的創作过程。我爱練習簿、墨水、笔……当我做了大学生的时候，我又不止一次地試行写作，不过这是一种不能写成一定形式、或者根本不能写成的創作的开端。……

我結婚很早，在十九岁的时候就跟一位学医的女大学生結了婚，到一九〇六年年底为止，我們一同过着一般大学生的勤懇

生活。和許多同学一样，我参加过学生运动和罢課，加入过社会民主党，担任过工学院的伙食委員。一九〇三年游行示威的时候，在喀山大教堂前面，我差点儿被扔出来的一块石头打死——幸亏我胸前大衣里塞着一本书，总算把我的命救下了。

一九〇五年，高等学校都停办了，我就到德雷斯登去，在那边的工科大学里讀了一年书。在那儿，我又重新写起詩来了——这中間有革命的詩（唐·包戈拉茲，甚至年輕的巴尔蒙特那时候都写这样的詩）和抒情詩。一九〇六年夏天回到薩馬拉以后，我把这些作品拿給母亲看。她忧愁地告訴我，这些詩写得十分平凡。因此这个抄本沒有保存下来。

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风格，这里头包含着思想、感觉和热情。这种新的风格，我那时候还没有，而且也还不会去創造它。

就在一九〇六年夏天，我母亲患脑膜炎去世。我动身去彼得堡，打算进工学院繼續讀書。

反动时代开始了，象征主义者跟它一起走到舞台的灯光前面了。……

在交通部做事的一个快艇水手、怪人和空想家康斯坦丁·謝尔盖耶維奇·万德尔佛里特，首先介紹我認識了他們的——維亞切斯拉夫·伊凡諾夫、巴尔蒙特、安得烈·別雷伊的作品。每天晚上，他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島自己的閣樓上，在煤油灯底下，給我讀那象征派的詩，而且帶着无比的幻想的热情談論着它們。

就在那时候，一九〇七年春天，我出了第一本“頹廢派”的詩集。这是一本模仿的、幼稚的、很糟的小册子。可是正由于这本东西，我替自己开辟了一条認識詩的現代形式的道路。一年以后，我又出了第二本詩集——“藍色河流后面”。这本詩集，直到

今天我也不覺得羞愧。“藍色河流後面”——這是我認識俄羅斯民間傳說和俄羅斯民間創作的成果。

那時候，我初次試作散文——“喜鵲的故事”。在這些故事里，我企圖用童話的形式來表現我童年時代的印象。但直到多年以後，在中篇小說“尼基達的童年”里，我才比較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。

我開始從事小說的寫作，應該歸功於和詩人兼翻譯家穆·伏洛申的接近。一九一〇年夏天，我听他讀他自己所翻譯的亨利·德·列尼哀^①的作品。那形象的雕琢很使我感動。追求形式的象征派作家，以及象列尼哀那樣的唯美主義者，使我初步掌握了在那時我還沒有的、而且缺少了它也不可能進行創作的東西——形式與技巧。

一九一〇年^②秋天，我寫了第一個中篇小說“在杜列尼瓦的一周”——這一篇後來編在“伏爾加左岸”里，再後來又編在“老菩提樹下”的增訂本里，“老菩提樹下”這個小說集描寫一部分貴族地主，他們的莊園逐漸被謝霍巴洛夫之類的新興大地主們收買去了。至於那些在土地上牢固地扎著根、已經發展成強大的農業貴族的地主們，我在小說里都沒有接觸到，因為我不了解他們。

接著又寫了兩個長篇：“跛老翁”和“怪人”；以我少年時代的四周環境為創作題材的第一個階段到這兒結束了。

① 亨利·德·列尼哀(1864—1936)是法國詩人、小說家，象征派的代表者之一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英譯文作1909年，原文作1910年。1949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出版的“阿·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集”英譯本中載有“在杜列尼瓦的一周”，篇末亦注1910年。——譯者注。

我写完了这种回忆的题材，便紧接着轉向現代的生活。在這兒我遭到了失敗。描寫現代生活的中篇和短篇小說，都是失敗的，都不是典型的。現在我明白它的原因了。原來我繼續生活在象征派的圈子里，他們的反动艺术不接受那暴风雨似地、严肃地赶过来迎接革命的現代生活。

象征主义者都退避到抽象和神秘中去了，都隱蔽到“象牙之塔”里去了，在那里他們企图等候那日益迫近的事情过去。

我爱生活，我全心全意地反对抽象，反对唯心主义的世界觀。在一九一〇年对我有用的东西，到一九一三年却損害起我，妨碍起我来了。

我非常明白这样子下去是不成的。我一向工作得很多，現在工作得更努力，可是結果却很慘：我沒有看見国家和人民的真正的生活。

战争开始了。我以战地記者（“俄罗斯新聞”）的身分上了前綫，到了英国和法国（一九一六年）。我的战争隨筆一直不曾再版——沙皇的书刊檢查机关不允許我尽量发表我所看見的和所感触的。仅仅有很少几篇那个时期的小說，編进了我的集子里。

可是我看見了真正的生活，我从自己身上剝掉了那件扣得紧紧的象征派的黑礼服，投身到生活中去。我看見了俄罗斯的人民。

在二月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，我把注意力轉向彼得大帝的題材。这一定是出于艺术家的本能，而不是出于有意識的思考，我在这个題材中想寻找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經国之术的解答。在这个新的工作中，已故的历史学家佛·佛·卡拉什給了我很大的帮助。他介紹我看到档案、樞密署和普列奧勃拉任斯基衙署的記錄，所謂“口供和案件”。俄罗斯語言的宝藏，在我面